

藏在俄罗斯的天津故事

徐晨蕾

俄罗斯的冬宫博物馆藏有一张100多年前的杨柳青年画,这张名为《业车图》的年画出自著名画店戴廉增(敬记),而它之所以能漂洋过海到俄罗斯,还得从汉学家阿理克在天津的“淘宝”经历说起。

漂洋过海的杨柳青年画

20世纪初,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有探险家、商人,也有学者。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理克就在其中,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阿理克”。他痴迷于中国的民间文化,尤其是那些贴在千家万户门上的年画,为收集这些年画,他曾三次来到中国,走遍华北、华东和华南。

1907年,阿理克来到了天津。当时天津是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市井繁华,文化交融。这里的杨柳青,更是中国北方年画重镇。阿理克购买了大量年画,其中一批来自一家名叫“戴廉增(敬记)”的画店,这家画店在天津一带颇有名气。在这批画中,有一幅让阿理克格外感兴趣:画面上,一个男人奋力拉着一辆沉重的篷车,车里车外,坐着他的一家老小,还有鸡、猫、狗和全部的家当。画面朴素,甚至有些笨拙,但其中蕴含的沉重力量,却触动人心。阿理克买下了它,但他想知道更多,如中国人到底怎么看这幅画?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和讲究?

在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年画,更没有解释年画故事的书籍和文献资料。怎么办呢?这位俄国学者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办法:他请来教自己汉语的中国先生,把画拿给他们看,请他们把对这幅画的理解,原原本本地写下来。

这个请求,一开始是遭到冷遇的。因为阿理克的中国先生们,多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在他们眼里,年画是“粗画”,是下层百姓的“精神粗粮”,难登大雅之堂,他们根本不屑于去解读。但阿理克没有放弃,他甚至以帮一位老师翻译德文资料作为交换,对方才“屈尊”动笔。就这样,在一张张巴掌大小的纸上,中国先生们用毛笔为阿理克收藏的成百上千幅年画,写下了最早的“年画故事书”,其中就包括这幅来自天津的《业车图》。这些解说纸片后来被精心装订成册,题名为《粗画解说》。《粗画解说》连同数千幅年画,后来都被阿理克带回国内,保存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和科学院档案馆里,直到近年才被学者重新发现。

“粗画解说”讲述百姓生计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张来自1907年的解说纸片,来探究这幅《业车图》到底在表述什么。

当时那位不知名的中国先生是这样写这幅年画故事的:“此系醒世的画。喻言凡有媳妇家累的,须在外争名夺利,辛苦劳碌,不得自由,亦永无息肩之日,如同拉车一般。车内老太太抱着箩筐,内插扇子等系拉车之母;女子抱小孩系拉车之媳妇;车沿上小姑娘拿着鞭子,系拉车之女儿;前头小孩系拉车之子;后有担挑者系拉车人之大儿子。



图片说明:

《业车图》和中国先生编号“二十七”的解说纸片。

挑内有铁镰刀、勺、碗筷、灶王爷等一切家伙。又车上有鸡、猫,下有狗……”

这段文字,完全是大白话,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这幅画的属性:“醒世的画”。什么是“醒世”?就是警醒世人,告诉人们生活的道理。它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单纯描绘风俗的“风俗画”,而是一幅“生存教育图”,是父辈用来教育儿子、婆婆用来规训儿媳的“教材”。

整个画以“拉车”为隐喻,画中的拉车人是一家之主,那个丈夫和父亲。解说告诉我们,只要你成了家,有了“媳妇家累”,你这辈子就得为了你的家业,必须在外头“争名夺利,辛苦劳碌”,而且“不得自由,亦永无息肩之日”。

车上的人与物,也被中国先生一一指明:老太太(拉车人的母亲)抱着个瓶子,里面插着扇子;媳妇(拉车人的妻子)抱着小孩;小姑娘(拉车人的女儿)拿着鞭子坐在车沿;小男孩(拉车人的小儿子)在车前头;大儿子(拉车人的长子)跟在车后,用扁担挑着一副担子。

我们看担子里挑的是什么?是“铁镰刀、勺、碗筷、灶王爷等一切家伙”。车上还有“鸡、猫”,车下有“狗”。

这不就是晚清动荡社会下,天津底层家庭的全部“移动资产”和全部家庭成员吗?单那个时代中国先生的解说,我们眼前就能展开一幅动态的画面:一个男人,咬着牙,绷紧全身的肌肉,拉着这辆超载的“家庭大篷车”,在社会不稳定的时代里艰难前行。车吱呀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但他不能停。

打捞消失的民俗细节

如果我们再细细品味这幅画和解说,就能发现更多已经消失的天津民俗细节和惊人的生存智慧。

第一,这是一套“移动的生产生活祭祀系统”。

这个“家业”,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实实在在的人和物构成的。铁镰刀是干农活的工具,碗筷锅勺是吃饭的家伙,这代表了生产和生活。最妙的是,他们连“灶王爷”的神像也挑着走!灶王爷是家神,掌管一家饮食,监察一家善恶。迁徙奔波,家可以暂时没有固定的房子,但灶王爷不能丢。这体现了中国家庭坚韧的信仰核心。鸡、猫、狗,

也各有职责:鸡司晨,猫捕鼠,狗看家,它们都是这个家庭维持运转的“功能组件”。所以,这辆车上装载的不是一个破败的家业,而是一套完整的、极简的、可以随时在异地“启动”的生存系统。这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里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部分底层家庭可能因务工、逃荒等原因而处于流动状态的真实境遇。

第二,这是一个精密运转的“家庭压力分配系统”。

这幅画绝不仅仅是感叹“生活好难”,它在冷静地展示一个家庭内部如何分工协作,共同承受压力。对男人来说:你是拉车的主力,是全家经济的唯一支柱。画和解说都在警告你:你必须拼命,车不能倒,全家都指望着你。对女人来说:媳妇抱着孩子,这象征着生育和哺育的双重责任。同时,她也身处“业车”中,同样承受着颠簸劳苦。解说中“媳妇家累”这个词,微妙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即妻子儿女,既是男人的情感归宿,也是他必须背负的“累赘”和责任。画中拿着鞭子的女儿也值得体味。她可能是在赶车,也可能暗示着她作为“半劳力”,已经需要开始分担家庭责任。有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华北农村,十三四岁的女孩下地干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老人和孩子来说:老太太抱着瓶和扇子。“瓶”谐音“平”,“扇”谐音“善”,合起来是“平善”,寓意平安和善,家族香火平稳延续。老人不直接出力拉车,但她承载着家庭的精神寄托和礼仪象征,起到“镇家”的作用。大儿子已经开始用扁担挑担,分担重量;小儿子虽无力,也在车前似在帮忙。这是一个典型的代际分工模型:老人守望,壮年苦干,孩子预备。所有人,从老到小,都在这个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共同维持着家族的延续。

第三,它揭示了现代人“四世同堂”浪漫想象背后的沉重现实。

我们今天常常怀念旧时“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但这幅《业车图》却撕开了温情的面纱,展示了其残酷的另一面。对于前工业时代的底层家庭来说,“同堂”意味着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一辆“业车”上。而在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时代里,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外部支援,所有的风险都要内部消化。所谓的“天伦之乐”,往往建立在个人极致的体力透支和全家人高度紧绷的协作之上。今天,这幅画的“醒世”作用还在延续,可以说于现代人而言,浪漫化的“四世同堂”,却是封建制度、动荡时代中底层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消逝的信息正是我们国家社会制度进步与女性地位提升的历史注脚。

跨越国界与时空的文化合作

这幅《业车图》是当时天津杨柳青年画行业的一个缩影。说明杨柳青年画不仅有向皇宫进贡的“金贡尖”,也有大量像《业车图》面向普通市民和农民的题材。这些画的故事内容直接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期盼与恐惧。“戴廉增(敬记)”能生产这样的画,说明它深谙本地市场,知道什么内容能引起劳苦大众的共鸣。而那位为阿理克写解说的中国先生,他虽然是个文人,但在解读时,他的笔触却非常市井、具体。他没有掉书袋,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像拉家常一样,指出这是母亲,那是媳妇,挑子里有灶王爷。他甚至可能为了弄懂某些细节,去问过街坊邻居、村口妇孺。可见,这幅画所描绘的生活在当时的天津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是人们一眼就能看懂、心领神会的“共情图”。

而阿理克这个外国人,通过“以工换文”的平等方式,机缘巧合地记录下了20世纪初天津老百姓的生存情景。这张小小的纸片是同时代人对同时代画的解说,也因此成为连接画内世界与画外天津的桥梁。让我们今天能够穿越时光,听到画中人的叹息,触摸到那个时代天津老百姓最真实的脉搏。

一张年画,一张纸片,一段跨越国界与时空的文化合作,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津记忆!100多年过去了,画面中的生活场景早已消失。男同胞不需要像牲口一样拉车来养活全家,家庭的结构和分工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业车图》和它的解说故事,依然有价值。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辈、曾祖辈是这样走过来的。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家”的含义的变迁,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居乐业。

如今,这张年画和它的故事静静地躺在俄罗斯的博物馆里,但它的根在天津。它讲述的是地地道道的、饱含汗水与温度的天津故事,它提醒我们:文献里的天津,不仅在浩繁的古籍中,也在这些曾贴遍千家万户、飘洋过海最终被珍藏起来的民间纸页里。挖掘它们、解读它们,就是打捞城市的历史记忆,传承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深沉、最质朴的文脉。

天津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FM91.1/AM1386)
周一至周五7:00和22:00播出



城市记忆故事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万视达

微信扫描二维码
即可收听生活广播



“文献里的天津”
天津民俗文化